

观点 | 词语作为子弹: “田园女权”的污名技术

原创 性平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10-09



在中文网络世界中,“田园女权”似乎是一个比“女权主义”更加火热的词汇。近年来,随着网络词汇日新月异的发展,“女拳”、“女O”、“拳师”、“打拳”等成为了更为常用和引人注目的词汇,但“田园女权”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越用越多,成为其他新晋用语的核心概念。

“田园女权”最初被用于贬义地指称部分中国本土女权，给女权加上一个限制形容词，认为部分中国本土女权是扭曲的、虚假的、不正确的，是一个“赝品”。说是“部分”中国女权，但“田园女权”的使用者们通常不会同时提出另一部分他们认为“可取”的中国女权，并十分广泛地使用“田园女权”，使得几乎所有可见的国内女权主义的声音和行动都难以逃脱被指责为“田园女权”的经历。

在早期，这种指称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被拿来和中国本土女权作对比的参照物，即西方女权。这种说法将西方女权视为“正统”，而将中国本土女权视为偏离正统的错误学说，冠之以“田园”的贬称。随着社会情况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西方女权这一参照物逐渐淡化，参照物演变成一种泛化的“正统”女权理论，“田园女权”这一词汇的攻击对象也逐渐扩展出地域国别的范围限制，不再只有国内的女权主义才会被称为“田园女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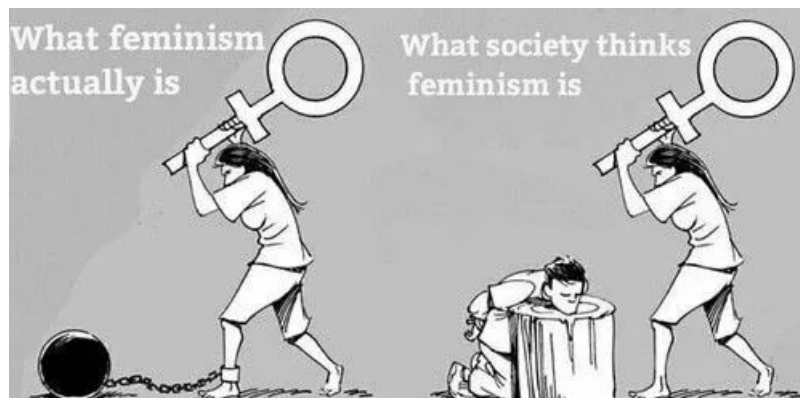


但事实上，在当前中文世界对于“田园女权”的使用中，参照物常常是想象的。使用者对于女权主义（无论是所谓西方女权主义还是各种地方性的发展、无论是所谓主流女权主义流派还是各种其他思潮）理论和运动史的认识、研究和理解常常是有限的，很多人在使用“田园女权”时，并没有一个具化的参照物，于是这种所谓对中国女权的批判愈发成为对国内女权声音普遍性的攻击，成为对女权整体的否定化描述用语，甚至成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反女权的托词。在互联网的论斗场中，论述过程更是被极端压缩，导致在复杂的社会性别问题面前本就难以展开的讨论直接被攻击与嘲讽取代。

假如我们切实地探讨可以被作为参照物的女权主义，我们也会发现当前被如此大范围地使用的“田园女权”也是极为不恰当、不妥当的。我们可以提出几个近年来中国女权主义者广泛讨论的议题和开展的运动，如反家暴、反性侵与性骚扰、就业歧视问题、升学歧视问题、生育自由问题、离婚问题、自由选择是否结婚的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都曾以同样的方向探讨过。以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为例，早在19世纪，女权主义者就在讨论离婚问题，并提出改变现有的家庭体制的要求。他们也认为妇女应当对自己的性活动和生育活动有决定权，这与今天还被认为“激进”、被攻击“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的对生育自由的主张是一致的。在讨论婚姻问题时，女权主义者乔治·埃利奥特在1866年便曾说“世上不存在任何不是由更广大的公共生活所决定的私生活”，反对婚姻中的父权结构。这句话放在近年国内对于婚姻问题的争论中依然有力。近年来国内女权主义者最为可见的行动“me too”更是与西方的“me too”运动直接衔接的，构成了全球“me too”浪潮的一部分。



不过，即使我们在这里分析了这种以西方为参照攻击中国女权为“赝品”的逻辑的虚假性，我们还是要提出，这种寻求“在别处”的参照物的逻辑是错误的。女权主义不应被视为舶来品，也不应被视为是以理论为本位的，**女权主义是处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压迫下的女性以及男性发出的声音，是要求破除性别不平等结构的呼声。女权主义的基础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分析与反应，而非参照和比较。**我们要观察、了解与回应的，是所有人的生活本身。



现如今，虽然“田园女权”的话术依然带有鲜明的在比较中特殊化本土女权的基因，但它已经被更普遍地直接用于对国内“某种”女权主义的指代——某种将争取女性权利扭曲为“坐享性别福利”的“女权主义”。**当我们说“田园女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时，我们并不表示这种行为是被虚构出的，而是要指出，“田园女权”作为一个概念被有意地扩大化、污名化并被加以利用。**

我们不否认有将女权作为为自己牟取特权、否认男性存在意义的名头和工具这样的行为和观念，但这些行为和观念被反女权者剧烈地放大和泛化了，甚至很多人是在嘲讽“田园女权”的人的口中听闻这些行为和观念的。在他们的抨击中，“女权主义者不想搬重物”淹没了“女权主义者要求就业机会平等”，“女权主义者煽动性别对立”淹没了“女权主义者反对性侵性

骚扰”，他们不断地引用前一种声音并加以嘲讽和攻击，尽管有时这种声音并不会被任何自称女权主义者的人所认领或认同，但他们反复将“女权”这个概念或单纯的这两个字加诸这种声音之上，由此淹没了女权主义者更为广泛和正面的诉求，也达成了对“女权”和女权主义者的污名化。

“田园女权”并不是这种污名话术创造出的唯一——个词汇。在流行的污名化词汇中，“性别福利”是另一个代表。使用者反女权主义之道而行，提出女性在从当前社会的性别结构中得到好处，指责“田园女权”想要固化这种好处，获得到更多这样的好处。实际上，在当前的大环境中，女性并没有从自己的性别得到更多的机会、尊重与安全感，相反，她们得到的是机会、尊重与安全感的缺乏。如果不用搬重物是一种性别福利的话，福利的另一面则是女性在就业中面对的歧视；如果彩礼是一种性别福利的话，福利的另一面则是女性受家庭暴力、婚内强奸以及其他性侵与性骚扰频率之高、程度之严重。



事实上，那些看似是女性从性别不公体制中得到的“好处”的东西，恰恰与那些在物质和精神上压迫女性的普遍现象共享同一套逻辑，在张扬着“好处”的同时将巨大的痛苦与不安返还给女性。这些“福利”作为性别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某种欺骗性表象，在污名话术的推动下，让许多人，不论性别，都对当前社会的性别关系与性别结构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女权主义者希望改变的。因此，反女权者将“彩礼”等女权主义者所反对的现行性别结构的产物称为“性别福利”，也是对女权主义者诉求的扭曲。另外，“性别福利”也具有模糊的含义，把女性应得而未得、在争取的权利说成是“性别

福利”，试图以此瓦解女权主义者的诉求。



“田园女权”一词使用范围之广、使用方式之微妙体现出国内女权主义的发展尚且艰难。在女权主义以改变社会整体结构性不公的面貌进入公众的视野、被更多人理解之前，它就已经在一轮轮的污名化与反污名化的缠斗中，沦为公众眼中值得怀疑的陈词滥调。或许在当下，让更多人有兴趣了解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已经是一个艰难的目标——许多人怀着偏颇的观念，却认为自己对女权主义已足够熟悉。

女权主义者处于裹足难进的困境，但或许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对国内的女权主义行动有更多的反思。在国内当下松散、虚弱、去中心化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权主义者们面临着思想的分化与单打独斗的疲惫，社会对女权主义者各种行动的评价也屡屡错位，“激进”与“温和”这样的形容词被不断地错用。在“婚驴”问题等事件中出现的对“激进”的批评，体现出许多人对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等概念和词汇存在理解上的偏差。辱骂已婚女性为婚驴的女权主义者并非是由于过于激进，而恰恰是不激进的，是没能充分理解女权主义的。当他们辱骂一个个已婚的个体，而不是批判结构性的不平等时，就已经削弱了反思婚姻制的力量。他们把问题归于个人选择，而不是社会结构；他们把火力集中于对个人的攻击，而不是对社会现状的改变。并且，在女性内部贴标签、划分阵营与敌我也恰恰落入了男权的陷阱。



但是，虽然我们强调女权主义运动的自我检讨与完善，我们也不应对上述这种女权主义避之不及。女权主义运动的进步并不是切割出一小块最正确、最无瑕的女权主义，我们要做的是形成一个阵营，建立紧密的沟通与联系，通过共同的反思与讨论，推进女权主义的理想。女权主义的逻辑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逻辑，是一种更平等、更解放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逻辑。

辑。身处不理想的焦虑、虚弱与愤怒中的我们，只有通过更紧密的交流与联结，才能更加接近烙印在女权主义背后获得解放的方式。



作者 | 啊咧

排版 | Domi 啊咧

